

怎样认识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型”问题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郭书田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高级经济师 北京 100020)

一、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的难点所在

我国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这是个带有战略性的举措,而这个转变又要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实现。这不仅是对工业部门的要求,也是对农业部门的要求。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的“转轨”,尽管在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方面还有很繁重的任务,毕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比起城市和国有工业来说,困难要小得多,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任务比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还要艰巨。这是由于有以下几个重大的制约因素: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经营规模过小,劳动生产率很低;二是我国的农业资源是很丰富的,但由于多种原因,利用和保护得不好,生态环境恶化,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断下降;三是农民的文化素质低,生产手段多数地区仍以人畜力为主,劳动效率很低;四是由于投入不足,农业的基础脆弱,后劲不足,农业的科技含量比较低,农业的基础地位和科教兴农的要求难以落实;五是由于农业人口过多,农产品的自给性生产的比重很大,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商品率比较低。以上因素就是农业“转型”的难点所在。

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又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需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这是因为:一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很大,加上新增加的人口和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对农产品在数量、品种、质量方面的需求很大;二是在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耕地不断减少,即使经过努力在总量上保持平衡,而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还要继续下降,这是难以逆转的;三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贸易国际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我国农产品面临极其严重的挑战,在许多方面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在由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在由以传统农业为主向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结合的“转变”过程中,在由以国内市场为

主向国内与国际两市场“接轨”过程中,都要求农业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这也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同时,要达到国际上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也必须走集约化的道路。

农业的“集约经营”通常人们是作为“粗放经营”的对称,即把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到较少的土地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60页)。哈尔(Hall)于1909年提出,使用肥料加上技术与知识来耕作就是集约经营。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提出农业的“四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以后又提出农业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都与实行农业的集约经营有关。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有的同志曾经提出,我国人多地少,只能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从而否定农业机械化的方向,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以后,西方出现批判“石油农业”的思潮,有的同志认为化学化走到了尽头,主张走“有机农业”的道路;在提倡大规模植树造林以后,有的同志提出保护和发展农业应以生物措施为主,否定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工程措施,等等。这些从不同的侧面提出的问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农业的集约经营,不应只看作是个肥料问题、机械问题、水利问题,应当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最终应看能否做到一定数量的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和效益,这里既有技术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因而需要进行综合性的考虑。

二、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型”的几项措施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我认为应着重研究和解决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提高科技含量。科技含量低是粗放经营的重要表现。根据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的分析,“七五”与“六五”相比,科技在增产中的因素由35%下降为28%,减少7个百分点,“八五”有所恢复,也只有33%,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中央要求在“九五”期间,科技含量达到50%,并不是很高的要求,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要实现这个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的,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做大量的工作。一是要增加对科技与教育的投入,使科教兴农的战略真正落到实处,使农业真正走上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二是农业科技工作重点突出两头,一头是科技后备,特别是生物技术和农畜产品的品种改良,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为建设优质产品基地创造条件;另一头是现有实用技术的推广,使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三是深化科研与教育体制改革,实行教育、科研、推广一体化,类似美国的农技推广体制,把科研成果的推广与农民的培训紧密地结合起来。四是健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以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为主,联结乡镇综合服务站,通过科技专业协会、科技示范户和农民技术员,辐射广大农民,形成试验、示范、推广、培训“四位一体”的有效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网络。五是在实行农业产业化(即农工商一体化或种养加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过程中,要以市场为目标,以科技为先导,即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

第二,提高现有耕地的产出率。我国农业的发展,既要着眼于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又要有计划地开发新的资源,包括非耕地的开发和利用,即山地农业、草地农业、水体农业、庭院农业等,形成农地、山地、草地、水体、庭院“五位一体”的大农业格局。在“九五”期间,提高现有耕地的产出率在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总量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因此,应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作为主攻方向。应该看到,从总体上说,目前我国单位面积产量不是很高的,高产田约占1/3,中低产田约占2/3,而且计算单位面积产量的统计面积与实际面积有较大的出入(统计面积小于实际面积约20%),单位面积产量比预计的产量还要低,从而看出这方面的增产潜力是很大的。认为我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而得出潜力不大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提高现有耕地的产出率,利用我国的气候资源,增加复种指数是必要的,而更重要的是运用综合的增产技术,提高产量,减少损失,在这方面无论是种植业,或是养殖业都大有文章可做。例如农膜的广泛使用,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获得了极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第三,提高抗灾能力。农业是生物性产业,受气候的影响极大。全球气候转暖,对农业的影响难以

估量。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报告,1995年是有气象记载以来(300年前)气温最高的一年,到2010年气温将上升2.4℃,海面将升高46cm,主要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南极臭氧洞达1000km²,比1993~1994年增加两倍。我国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三废”(气、水、渣)的污染不断增加,大量使用燃煤,由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引起的酸雨面积迅速扩展,对农作物和人民的健康危害甚大。由于投入不足,我国农田灌溉面积的增长基本处于徘徊状态(50%左右),水土流失面积、沙漠化面积和岩溶地区的石漠化面积各占国土面积的15%左右,草原的“三化”(沙、碱、退)面积继续在扩大,等等。我国农业的抗灾能力逐年下降,成灾率由1978年的42%上升到1994年的57%,这是十分可怕的。近十几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的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目前仍处于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状态。1992年在巴西首脑会议之后,提出了《21世纪议程》和十大对策,其中强调发展生态农业,各地也出现了使农业走向经济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道路的许多典型。农业部等七个部委成立了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已在50个县中实施生态农业建设工程。辽宁本溪市过去污染严重,被称之为卫星看不见的城市,经过几年的努力,已见成效。他们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双线”治理战略,一是建立了相当于城市面积8倍的环境森林带;二是在所辖的两个县和两个郊区中,以小流域治理为中心,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综合开发,形成了对城市的第二个绿色包围圈,加上城市本身对工业粉尘的治理,环境状况有很大改观。1995年太子河出现百年不遇的洪水,本溪安然无恙,减少了损失。本溪的实践引起了联合国环境开发署和秘书长加利的重视,拍了录相片,在联合国放映。因此,在“九五”期间和到2010年的15年中,除了增加对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的投资,加速大江大河的治理,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外,还要大力推广行之有效的生态农业,并与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结合起来,实现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四,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由于农业人口多,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形成了超小型的农户经济,经营规模过小,劳动生产率过低,这是农业效益低的重要原因。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工业化中城市化滞后,在城市化中小城市滞后,以致出现工业比重达80%,而城市人口不到30%的畸形格局,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最突出的是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农村土地上,这是农民长期贫困的重要病根。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这种局面有了很

大改变。1994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74%，吸纳农村劳动力1.2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7%。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出现了一批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乡、村，建成了一批作为工业载体的小城镇并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发达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新格局，并通过以工补农和以工建农，加强了农田基本建设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水利和机械化，提高了科学种田水平。主要表现在“四率”的提高，即土地产出率、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农业的基础地位得以巩固，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农业效益日益增加，农业真正成为具有较高效率的产业，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当然，目前象这样的乡、村在全国还是少数，但能看出方向和前景。实现这项目标的关键在于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更应加速发展乡镇企业。它既解决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过多的社会问题，又能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竞争能力。在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中要避免已出现的问题，如布局分散、占地过多、环境污染等，要把建立工业小区与发展小城镇结合起来。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应把重点放在以农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上，形成有特色的乡镇企业，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因此，应继续实行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五，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我国农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只能生产初级产品，不能参与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改革开放以后，在一些地区突破这个分割的体制，开始走上农工商一体化的道路，即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使农民得到一部分通过加工增值的效益，这是很可喜的。农业产业化把农业的发展与乡镇企业的兴起紧密结合起来，是农业产业化重要特点。1996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认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和农村工作的又一个创造，最终形成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化一体”格局，这对农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作了一个很好的描绘。同时，对产业化的内容提出“布局区域化、产业专业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一体化、管理企业化”。我认为，除此以外，还应强调产权股份化、手段工业化、组织合作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农工商的主体必然是多元化的，因此应通过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把产权问题解决好，避免重新出现吃大锅饭或平调的问题。农业产业化就是用先进的生产手段从事农业生产，采用新的技术，达到先进水平，从根本上提高生产效率。在产业化过程中，采取公司加农户的形式，特别是一些大公司进入农业，是个很好的苗头。我们提倡在产业化过程中采取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它应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民主管理，能体现农民行使决策参与权、

收益分配权、资产处置权和管理人员选择权，真正当家做主，并有利于改善基层政权的工作。在这个联合体内，能够调节农业、工业、商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利润返还的制度，有利于促进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

第六，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农业的粗放经营，既表现为技术粗放，又表现为管理粗放。管理粗放是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调查分析，我国粮食的产后损失（包括收割、运输、贮藏、加工、消费五个环节），占产量的18%（如以9000亿斤计算，一年全国损失1620亿斤，还不包括病虫害的损失），是相当惊人的；在养殖业方面，养猪的死亡率约为10%左右，养鸡的死亡率约为20%左右；在生产资料方面，化肥的使用效率只有30~40%，也是比较低的。因此要特别重视加强经营管理工作，在增加产量、改善品质的同时，努力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同时还要牢固树立资源=资产的观念，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克服任意浪费资源的现象。土地是不可再生又不能移动的最珍贵的农业资源，要做好基本农田保护的工作，严格控制耕地的占用，做到用地养地相结合，不断提高地力，增加产出率。为此，特别需要解决好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问题，建立使用权流动的土地市场，促进土地的适当集中，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益。

第七，提高政府调控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府的调控是特别重要的。一是实行精兵简政，改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部门分割的管理体制，调整职能，从以直接管理为主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这样就可减少各级政府“吃皇粮”的公务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提高调控能力，消除腐败现象。二是继续改革粮棉等大宗的农产品以及生产资料购销体制和价格体制，由市场的供需形成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的合理比价，实现等价交换，在公开、公平、平等的条件下开展竞争，反对垄断，在全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三是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教育的投入，从宏观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四是建立和健全国家重要农产品的储备体系，增强调控手段，采取必要的吞吐措施，调节市场，平抑价格，保护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五是运用税收、信贷、财政等手段，扶持和保护关系国计民生的弱质产业，增强竞争能力，缩小城乡、工农、地区之间的差距，促进社会安定；同时利用国际资源，调节品种以及丰欠的余缺，努力增加出口，提高创汇的经济效益。六是加强农业的法制建设，包括立法和执法监督，使农业真正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

（责任编辑 蔡德诚）